

《玉城如海》:切入生命咽喉的剃须刀

□张丽军



徐则臣

《玉城如海》呈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它体现了一个人对自我内心之恶的不容忍,希望获得“清洗”、得到救赎的愿望。这种救赎是每一个人的,就像一把切入生命咽喉的“剃须刀”一样,让我们疼痛不已,不断审视和拷问自我生命的灵魂。

“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这就是徐则臣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玉城如海》的开头,极具隐喻性。主人公一出场,作者就让他在一个非常日常化的活动——剃须中,被剃须刀割伤了喉咙。咽喉是人身中一个非常要害的部位,一把剃须刀切进咽喉里去,这不仅意味着主人公余松坡的生活可能处于某种危机之中,也隐喻着我们这个时代要害部位可能也处于某种危机之中。在急速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可能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小说开头“剃须刀切入咽喉”这一场景写得很抓人,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玉城如海》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一把切入他们生命咽喉的“剃须刀”,都有他们内心的疼痛。

在《玉城如海》中,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看到了不同阶层人物的成长、奋斗史,也看到了当代中国内在的“断裂”。小说的男主人公余松坡是一个有着乡村背景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先锋戏剧导演,在美国待了20年后回到国内创作了《城市启示录》这一戏剧。然而,余松坡的生活依然有各种焦虑和危机。一方面是他因没能处理好《城市启示录》中教授对“蚁族”发表的评论而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另一方面余松坡因多年前举报了自己的堂哥余佳山导致他被关进监狱15年最终陷入癫狂而始终无法原谅自己。这种愧疚和负罪感没有随着光阴的流转而渐渐淡漠,它“越发清晰、深入”,切出的伤口反而在时间冲刷下愈来愈深,就像一把切入咽喉的剃须刀一样始终在用像线一样细微却又清晰的疼痛感提醒他

这段往事的存在。生命的创伤始终没有愈合,尽管表面上余松坡是一个非常体面的、成功的先锋戏剧导演,但是他内心有一个巨大的空洞始终没有被填补。这种内心的疼痛是他无法抹平的,它时不时地就会发作,让他处于崩溃的边缘,只有在《二泉映月》的乐声里,他才能沉静下来,获得暂时的解脱。

小说中还有另一个阶层的存在。余松坡家的保姆罗冬雨来自苏北农村,她为了弟弟罗龙河毕业后能在北京扎下根而来到这里打拼。因为出色的护理能力和对职业道德的坚守,罗冬雨成为余家的保姆,在余松坡的家中成为了一个谁也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罗冬雨对这个家稳定和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女主人祁红也无法做到的。罗冬雨的存在使这个有些“分裂”的家可以以一种“完整”、“美好”的

面目示人。罗冬雨尽管是个保姆,但对孩子余果来说罗冬雨就是他的妈妈,她在余果的成长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罗冬雨对余松坡来说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罗冬雨的谨慎和缄默使得余松坡可以保护自己的“秘密”维持体面,也使得他的伤口不再被更多好奇的目光刺探。在小说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罗冬雨出色的处理工作、情感之间关系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罗冬雨在余家也处于一个“要害”的地位。

余家的这种生活对罗冬雨来说,也是“必要的”。尽管罗冬雨来自底层,但她向往并且也习惯了余松坡家的这种生活模式,喜欢帮余松坡整理文稿,也喜欢这种让家里变得整洁有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对余果的感情让她不忍离开。这就让罗冬雨处于某种“分裂”之中,她的生活与她的感情亦如此。罗冬雨自己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弟弟罗龙河与她同在北京“漂”着,为了能让弟弟在北京扎下根,不得不加倍打拼,暂时搁置与男朋友韩山回家安定下来的计划。这种“分裂”在罗冬雨与韩山之间的关系中体现的更为明显。罗冬雨与韩山有同一个故乡,他们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和青春记忆。那时候在苏北小镇上骑着摩托车的韩山很是扎眼。小说中一写到他们的高中时期笔调就变得轻快活泼起来,又回到了徐则臣以前的那种写法。这是徐则臣擅长的一部分。但这同一个“来处”也是现在罗冬雨与韩山为数不多的共同之处,罗冬雨越适应余家的生活,她与韩山之间的差距就越大。罗冬雨实际上处于一种巨大的断裂之中,一方面她已经与现在这种城市生活融为一体,但另一方面她又有无法抹去的乡村记忆,无论是在生活习惯还是在精神文化上,她都无法彻底将自己划分到哪一边。这“断裂”既是罗冬雨、韩山的,也是当下中国千千万万人的。《耶路撒冷》中“尽管有故乡,但故乡再也回不去了”的主题在这里再次出现。

小说对这种“断裂”和创伤的呈现,随着故事情节一步步深入。这是徐则臣非常擅长的一个模式,就像剥春笋一样,一层层的剥开,一步步进入最隐秘的核心。小说刚开头余松坡与《二泉映月》的关系,他与天桥上那个卖空气的流浪汉的关系都是一个谜。这个谜因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各种巧合而被逐渐揭开:大学生罗龙河的女朋友鹿茵因迫切想要成功的渴望不惜通过“潜规则”的方式来争取余松坡戏剧中的一个次要角色,这一幕恰好被韩山看见,而韩山对余松坡的报复、嫉妒心理又使得他故意把这一消息透露给罗龙河。明亮耀眼的太阳也有阴影,原本将余松坡视为神明的罗龙河因此产生了窥视和报复余松坡的念头。在帮助姐姐罗冬雨整理杂物时,罗龙河看到余松坡的“遗书”,发现了余松坡不为人知的“秘密”。在罗龙河的安排下,余佳山被带到余家,余松坡的命运也因此改变。小说处处有“戏”,最后一幕四人在家中发生的惨剧,正像一场戏的高潮部分,最后要由主人公余松坡来面对这一切。多年来,余松坡始终无法面对余佳山,因为余佳山时刻提醒着他的卑劣和犯下的过错。无论他怎样忏悔都无法弥补余佳山付出的巨大代价。他必须面对自己犯下的罪,只有赎清了自己的罪他的灵魂才能被清洗,才能“重新做回一个心无挂碍的善良人”。

在这最后一幕“戏”中,罗冬雨也经受了一次痛苦的撕裂。罗冬雨的本能是保护自己的弟弟,但慌乱过后对余家人,特别是对孩子余果的牵挂让她选择留下来,承担责任。这是罗冬雨对弟弟、也是对自己的救赎。《玉城如海》接续《耶路撒冷》的“救赎”主题,它关注的仍然是人的内心,是每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疼痛的问题。

《玉城如海》的故事结构别具匠心,作者采用了双线结构,戏剧《城市启示录》出现在小说每一章的开头,而故事中的人物与主题也不断交叉构成一种对话关系。《城市启示录》中一个

满肚子城市知识的教授从伦敦回来,带着儿子和猴子小汤姆来到北京,既看到了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难以想象的活力和无限可能性,也看到了这个“庞大固埃”的混乱、喧嚣和焦灼。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非自足性”意味着“城市化远未完成,距离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北京也是余松坡生活和创作的地方,它既联结着他过去的隐痛,也与他现在的艺术“危机”有关。在戏剧与小小说不断地交叉、互动中,中国现代都市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和危机都被凸显出来。“北京”成为一个象征的符号,活跃在其中的“蚁族”大学生、卖菜的、出租车司机、地铁乘客的生活正是我们现实生活的艺术折射。雾霭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环境问题,它也在人心里,给人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内伤。

《玉城如海》不仅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的“雾霾”带到小说中来,还提到了“蚁族”,呈现了如何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阶层对峙、阶层裂痕的问题。小说没有像以往的底层文学一样,把我们的苦难大肆渲染。徐则臣非常克制,只让这些痛苦在小说中露出了冰山一角,而冰面下的部分是要靠每个读者联系自身的生命体验来补全的。人们会在这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徐则臣用这样一种方式将我们时代的“割裂”和“对立”展示出来。这种“割裂”和“对立”也是余松坡本身精神创伤的一个根源。余松坡曾是那个时代“蚁族”的一员,艰难地走了出来获得“成功”,但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原谅自己,他和他父亲终身都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玉城如海》呈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它体现了一个人对自我内心之恶的不容忍,希望获得“清洗”、得到救赎的愿望。这种救赎既是余松坡、罗冬雨的,也是每一个人的,就像一把切入生命咽喉的“剃须刀”一样,让我们疼痛不已,不断审视和拷问自我生命的灵魂。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藏珠记》有着通俗小说的轮廓,也符合标准的通俗小说的故事形态。主人公唐珠本是唐朝少女,从一波斯商人处获奇珠吞于腹内,这颗红珠子给予她永生的能力,但永生的前提就是保持处子之身。她领略过广阔风景,各朝的史传和畅销书皆入眼底,多少天子、时代在她眼皮底下灰飞烟灭,唐珠一直活着,隐匿于繁华都市里,是一个心里住着千年老灵魂的妙龄少女。惟一能安慰她孤独心灵的,只有吃和关于“吃”的学问。

也正是有关“吃”的交锋,引导了唐珠和金泽的相遇相识。对于“官二代”金泽来说,吃不仅仅意味着人世最大的兴味,还代表了对爷爷的亲情,这份朴实的信念让他抵御了父亲的急功近利。他诚实的为人态度让唐珠心生好感,从此开启了每日“生存还是死亡”的自我诘问。二人的耳鬓厮磨不能突破最后的身体防线,因此,二人的感情也只能随着金泽与唐珠对“吃”的交流来发展和呈现。

对于吃货女孩,会做菜的男人最有魅力。金泽身上男人的专注和少男的淘气混合在一起,牢牢俘获了唐珠的“少女心”。“惊黄瓜”的插曲更是让唐珠心动不已,“他比画着:对了,黄瓜在案板上摆放的位置要和肚脐眼平行……这样拍出来的黄瓜刚刚被榨出水分,水分却还被黄瓜咬着,没有流失出来,口感最好。”类似于“惊黄瓜资格证”的这些玩笑和“忽悠”,补充了缺失的儿女肌肤之亲,这是饮食出现在这里最为重要的象征功能。

金泽认真钻研食材的“物性”,他一语双关地说:“猪能对付松露,能把松露从地下拱出来,所以松露还有一个名字,叫猪拱菌。”“不过,得是母猪。”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既然二人的感情始终只是徘徊在生死攸关的边缘,那么饮食的分量就需要加重,用饮食来替代男女情欲,是一种象征笔法和回避手段。

《藏珠记》从《广异质》《资治通鉴》等书籍里化用了大量的历史故事、趣闻以及博物纪录,甚至让伟大时代的书写者(比如李白)浮光掠影地出现。一边是虚构一边是写实,这种结合一方面交代了主人公唐珠的来历,另一方面也是在呈现这些密集知识的吸收者——唐珠,为了保命而必然选择的自我疏离。

唐珠虽然曾与那些流芳百世的人物同时代,但并没有过多的交集,历史似乎从来没有融入到唐珠的血液。唐珠的机敏、苍老和世故只有她自己与读者知道,这难免让人觉得遗憾,身世秘密里暗藏的张力本来是可以放大的,如果能够多加

细致的「任性」

——读乔叶《藏珠记》

□陈若谷

乔叶在意的是一份情感充沛的人生。人生有限,只有一个“情”字能够留下印记。这也是作家之所以大胆写下这么一部“幼稚、肤浅”的小说的心理凭恃。

一些传奇的细节,故事会变得更饱满和有趣味。

而乔叶的做法则是,以一堆精细的“素材”勾连呈现从唐天宝年间到21世纪的漫长历史:史典、食货、器物、贵胄、诗人……这些刻在历史故纸堆里的僵硬痕迹,或者散落在市井生活中的“边角料”都被打捞出来,拿去点缀唐珠的阅历:“葡萄镜、花鸟镜、盘龙镜、双鱼镜、八卦镜……1400多年来,我不知道照过多少面镜子。”唐珠也会任性地去弄自己的“学识”,比如她随口就能引用《唐律疏议》。这些虽然展现了唐珠的经历,强化了她身世的说服力,也增加了小说的黏稠度和互文趣味。但是,这些固定的材料,只能说明历史之历史,而说明不了唐珠的历史,活在这些日子中的唐珠,只能把回忆拿来在心头默念,有知识而无情感,有见识而无胆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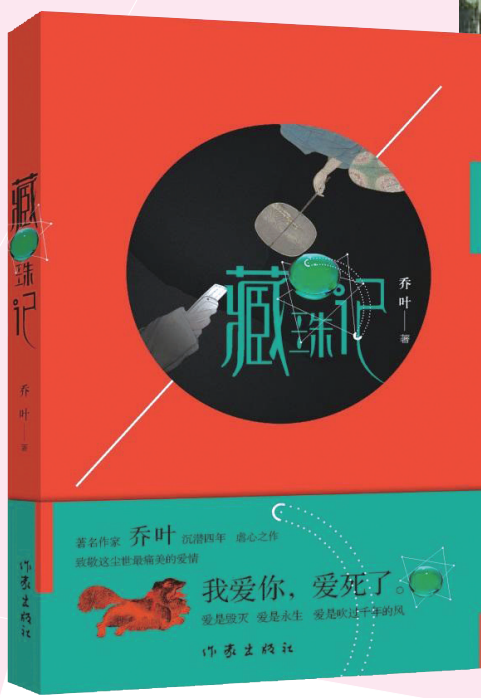
唐珠只要靠着自己的阅历就足够内部顺畅循环,没有困惑和焦虑。历史只是外在的流向,无法把她卷进去,唐珠这个封闭的内在场域,一心只求自保和永存,她其实也不希望参与历史的进程。她既不冒尖也不落后,面目平淡。年年循环往复的人生,让唐珠习惯了从古人遗落的辞藻里寻找自己的心情。世间的人事对她不构成挑战,因为她苍老的眼一下就可以看透。这也导致

了文本的另一个缺憾,人物力量的匹配不均衡。惟一能给唐珠制造麻烦的就是赵耀,还有金家的姑妈,而除了些许的紧张,她是能够大体控制的。因此,整部《藏珠记》,整个1000多年的岁月,都是唐珠在上演孤单的独角戏。

《藏珠记》的主题并不是少年滋味不识愁的“简单爱”,唐珠最终走向金泽,一方面来自外来介入,一方面是对自我命运的怀疑。唐珠的生命可以无损耗地空转,只要保持中庸和无趣。但她的背脊常感受到向死驱力的蛊惑,“偶尔惹点事儿,和他人博弈一下,似乎能有效地凸显出我的存在感:你还生猛地活着呢。”唐珠最后选择了任性,热热烈烈地奔入人间。

唐珠迎来了令人欣慰和坦然的衰老,属于她的情绪和智慧终于可以参与到自我的历史里。故事进行到这里,方知作者乔叶在意的是一份情感充沛的人生。人生有限,只有一个“情”字能够留下印记。这也是作家之所以大胆写下这么一部“幼稚、肤浅”的小说的心理凭恃。

细读之下可以发现,《藏珠记》与《最慢的是



乔叶

活着》分享了同一种情感体验。它们在主题上都讲述了“爱”,一个是爱情,一个是亲情,以相似的伏线进行互补;在人物塑造上,唐珠这个既是老人

也是少女的矛盾形象,正好是《最慢的是活着》里“我”和奶奶的结合。惟一的不同是,《藏珠记》的氛围更为欢快,这和金泽的外在视角有关,金泽年轻单纯,对世界一无所知,他提供了一种懵懂活泼的叙述,而其他人物,比如唐珠、金旺和松爷爷,都像《最慢的是活着》里那些“懂事”的成年人,也只有懂事的成年人人才了解深情。所以,《藏珠记》并非真正的“游戏”之作,这是拿命博来的爱和领悟。

实际上,《藏珠记》的写法实在不能算“潇洒”,它并没有让女主角倾国倾城,也没有让男主角富可敌国,他们的一米一蔬都要靠自己实实在在的积累。这还是类似于王安忆所说的,小说要先解决人的“生计”问题,小说的语言也非常口语化。小说太务实,太认真,以至于这种任性呈现出来的特点不是随意,而是细致。比如唐珠会吟诵大量的诗词曲,乍一看这个小保姆真是过于博学,但那些词曲都是作者精心筛选的结果,既要

符合每一种浮上心头的情绪,又反证了唐珠曾经青楼歌妓的身份。

词是诗余,小说是词余,乔叶早在《藏珠记》出世之前就把小说从她的创作谱系里剥离了,而将之视作可以游戏和任性的“严肃文学”之“余”。当自我的“任性”被描述出来的时候,作家又难以真的放弃对价值的追求。因此,一部轻松的玩笑之作,也认真地引用了那么多资料,呈现了一个从大唐走来的少女的复杂灵魂。

纯文学是严肃的心灵交流,留不下心灵震颤和痛苦记忆的都是扁平化的通俗文学,只有前者才具有拯救和超越的能力。但是,《藏珠记》这个通俗故事仅仅是看似俏皮,实际上却承担着很重的使命,写作《藏珠记》这件事对乔叶本人意义非凡,她自己陈述道,经历了《认罪书》的写作和一些灰暗的生活经历,身心俱疲的时候就只有琢磨各种细节来修整心情。那颗藏匿了千年的红珠子,像一颗醒目的氢气球,带作者从布满荆棘的荒野上逃逸。套用奥西普·布里克的逻辑,即使没有乔叶,《认罪书》也不会被创造出来。可是没有乔叶,《藏珠记》却也不会出现。“个人化写作”并不是自信个体对强大的外部世界宣战时的口号,而是切己的个人拯救,“任性”其实是最浪漫的自我取悦。因此,《藏珠记》这个文本,在立意之初和写作过程中,就已经实践了它自己的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